

埃福特會談祇是一個開始，到埃福特是正確、必要、而有益。

由此以觀，在歐洲和緩局勢下，東西德會談勢將繼續進行，今後的發展趨勢推測如下：

- (一)東西德雙方可能均加入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為會員國。
- (二)西德不明示承認東德，但容忍以默示方式承認東德。
- (三)西德期待國際局勢發生變化，設法以民族主義爭取東德居民。
- (四)國際局勢如不變化，東西德將從此更行分裂，統一的希望更為渺茫。

烏拉圭共黨與烏國的城市暴亂

王建勛

南美洲的烏拉圭，曾是一個民主色彩濃厚的國家。惟自一九六三年起，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經濟危機，共黨乘機製造社會混亂，烏拉圭已失去往昔的光彩。尤其近兩年共黨城市暴亂擴大，特別在首都蒙特維多，搶劫、暗殺、綁架等風潮，充滿恐怖景象。城市裏，白天一片蕭條，入晚更是死寂，有如癱瘓。但共黨暴力的表現，更招致了人民的反感，這是共黨暴力企圖，最後終歸失敗的主要原因。

壹 烏共武裝鬥爭勢力的崛起

烏拉圭共黨，除了一九三三至三五年間曾被禁止，其活動一直是合法的。在南美洲，烏拉圭共黨不僅與智利一樣，均具有合法地位，並且亦是唯一曾參加第三共黨國際的共黨。所以長久以來，烏拉圭就是國際共黨集會的場所，國際共黨在南美活動的總部。

烏拉圭共黨組織，起初是以工人為骨幹，在本質上言，僅是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已。其後，烏拉圭共黨企圖控制整個工會運動，因為社會黨的對抗，並無成就，所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烏拉圭共黨的發展仍是非常緩

①在布蘭德內閣以前，西德政府均主張：西德政府是全德國的唯一合法代表。

②依霍爾斯坦原則，與西德有邦交的國家如承認東德，西德即與之斷絕邦交。

③東德的借口是：戰後西德對東德實施經濟戰，干涉東德內政，使東德遭受莫大損害。西德方面認為此係東德討價還價之條件。

慢。直到一九五〇年，由於蘇俄的積極援助，勢力始告增強；不但對工會取得領導地位，在國會中亦獲得五個席次。

一九五五年，烏拉圭共黨內部發生鬥爭，共黨頭子哥奧麥茲（Eugenio Gómez）的親史達林路線遭到排斥，他被解除了職務，改由阿瑞斯孟第（Rodney Arismendi）出任第一總書記，其他一些反史達林份子如羅德里蓋（E. Rodríguez）、路易斯（José Luis Masra）、巴斯托里諾（E. Pastorino）、蘇區萊茲（A. Suarez）、貝萊茲（J. Perez）、阿爾德索（Alberto Altesor）等，亦都取得烏共領導的重要地位。此一烏共新領導階層，從一九五八年開始，即藉口國家經濟已遭到「資本主義」的壓迫，而展開反對「美帝國主義」的鬥爭，因而在策略上亦有了新的轉變，特別是在一九六一年，為達成反「帝國主義」及反「資本主義」的「社會革命」，乃積極爭取左派，實行左派團結運動，但因社會黨拒絕與共黨合作，而未成功。一九六二年，烏拉圭共黨放棄社會黨，採取一種單獨行動，與「左派解放陣線」（Frente Izquierda de Liberación），以及「東方革命運動」（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Oriental）結合。「左派解放陣線」

較為激進，由柯拉佐（Ariel Collazo）和古埃爾伏（A. Cuervo）領導的「東方革命運動」，係走卡斯楚路線，更主張武裝鬥爭。所以在它們結合以後，在策略上又有了新的更張；在確立「人民解放」與土地改革兩大鬥爭目標上，為要排斥外國資本、推翻大地主及資產階級的特權，主張土地收歸國有，金融與企業均收歸國營，並與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、美洲開發銀行等斷絕關係，對外貿易及海運均由國家控制。他們認為在這個目標上最有效的方法，乃是一方以溫和的政策配合在國會中直接鬥爭的行動，一方從事武裝鬥爭。

誠然的，社會黨拒絕與共黨合作，迫使共黨開始走向極端，而共黨逐漸趨向激進的政策，亦引起社會黨內部的分裂，使社會黨感到不安。所以在歷次選舉中，社會黨都對共黨採取抵制。一九六二年大選，共黨仍僅獲得百分之三·四九的選票，同時，在國會選舉中，亦一敗塗地，沒有獲得一個席位（註一）。因而一些激進的共黨份子有感於合法鬥爭難以獲得勝利，而更加深了「暴力革命」的意識。面臨拉丁美洲各地所燃起的革命火焰，更多的共黨激進份子要走向極端，隨之共黨武裝叛亂就在烏拉圭出現。

貳 烏共武裝顛覆策略的演變

一九六三年，烏拉圭在西歐的肉類市場遭到阻礙；主要是一方由於瘟疫的流行，影響了農產品的銷路，一方是美國亦以大量肉類輸入西歐，而打擊了烏拉圭的重要市場。並且美國不斷提高羊毛進口稅，亦限制了烏拉圭羊毛的出口，使烏拉圭的經濟遭到嚴重損害。由於外匯的短缺，黑市不斷升高，比索（Peso）一再貶值。同時，在通貨膨脹中，烏國在稅收方面亦未能配合日益上漲的物價而增加，欠稅逃稅案件增多，而使得政府歲入更為減少，其財政惡化，已無法緩和通貨膨脹的情勢。在經濟危機中所引起的大規模工人失業，更助長了共黨勢力的擴充，在共黨加緊向學生以及勞工羣衆滲透以後，烏拉圭的政治與社會就進入了混亂局面。至一九六四年九月，烏國雖與古巴斷絕了外交關係，但已無法避免卡斯楚主義對共黨武裝叛亂的影響。

烏共武裝叛亂，最初只是由青年共黨份子桑地（Raul Sendie）在巴依薩都（Paysandu）、薩拉多（Salto）、阿蒂加斯（Artigas）等城市中心領導工人與學生暴亂，而後才有「卡斯楚主義」份子在這些地方從事共黨武

裝叛亂組織的建立。一九六三年七月，他們發動第一次叛亂，在埃爾維利亞（Nueva Helveia）地方搶劫了一個重要軍火庫，以他們所現持的武器，建立了一支「人民解放軍」，從此工人與學生的暴亂，「卡斯楚主義」的武裝鬥爭就有結合的趨向。惟因他們之間的份子頗為複雜，雖都主張「暴力革命」，強調「武裝鬥爭」，但在方式上，究竟是採取「鄉村游擊戰」，抑或「城市游擊戰」，却有着不同意見，因此，他們在行動上仍是非常紊亂。

一九六四年間，桑地除了領導城市中的學生與工人暴亂以外，亦向巴依薩都、別雅烏立奧（Bell Union Treinta）等郊外產米地區發展，企圖使城市暴亂能與農民發生聯繫。這亦是卡斯楚「鄉村游擊戰」的理論，已在拉丁美洲蔓延，影響了烏共不肯放棄鄉村游擊戰的觀念。在這段期間，桑地也利用蔗糖工人罷工的機會，來加強城市中的聯繫，他企圖利用半城市化、半鄉村化的蔗工示威運動，激發城市中的「中產階級」與「小資產階級」的革命意識，而使鄉村與城市的武裝叛亂力量，達成一種平衡。但是直到一九六七年共黨武裝叛亂活動仍僅限於城市，「鄉村游擊戰」一直無法實現。其原因有下列三點：

一、烏拉圭地勢平坦，不像委內瑞拉、哥倫比亞、祕魯、巴西等境內山脈縱橫，使游擊隊能夠在山區潛伏和擴張。

二、烏拉圭全國二百五十萬人口，有百分之八十聚集在城市，而首都蒙特維多就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。所以烏拉圭都市人口的集中，却成為共黨要選擇城市暴亂的主要原因。

三、拉丁美洲共黨山區叛亂的普遍失敗，亦是一個重要的影響。以古巴而言，古巴之赤化，主要是在巴蒂斯塔（Batista）長期獨裁統治時期，已引起古巴人民反感，而卡斯楚乘機活動，以改革者姿態煽動人民，並利用山區游擊戰奪取政權。當時不僅古巴人民對卡斯楚毫無認識，國際間亦不明古巴「叛亂運動」的真正性質。古巴赤化以後，情況顯然不同了：美國對拉丁美洲防衛與援助、蘇俄對古巴革命輸出的限制，以及拉丁美洲國家的提高警惕，使得卡斯楚的武裝顛覆計劃，在拉丁美洲不再成功的機會了。諸如一九六二年巴拉圭共黨游擊隊的清剿，委內瑞拉、祕魯、阿根廷、哥倫比亞以及巴西的共黨山區叛亂組織先後遭到圍剿。一九六七年，古巴共黨頭子蓋瓦拉（Ernesto Ché Guevara）在玻利維亞被擊斃，更是拉丁美洲共黨武裝

鬥爭上的一個嚴重創傷。拉丁美洲共黨「山區游擊戰」的衰敗，就成為烏拉圭共黨在武裝叛亂方面的前車之鑑。

叁 「武裝鬥爭」與「傳統派」共黨

烏共的城市暴亂組織，一般都稱之為「杜巴瑪羅斯」(Tupamaros)，這個名稱是來自於十八世紀末期，印第安革命領袖杜巴克·阿馬萊(Tupac Amara)的名字。他於一八七二年在古佐(Cuzco)軍事廣場被處死刑，而成為印第安人的「英雄」。他的「犧牲」，使得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擴大，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革命隨之而起。所以當時拉丁美洲國家在對抗西班牙統治的革命，都稱之為「杜巴瑪羅斯」。烏拉圭共黨城市暴亂組織，使用這個名稱，就是要確立他們當前的革命行動，如同反對西班牙統治的革命一樣。

當拉丁美洲各地共黨在山區叛亂，普遍遭到失敗的時候，中美洲的瓜地馬拉共黨首先採用城市游擊戰的方式。首都瓜地馬拉城，幾乎每天都有綁架、暗殺以及投擲炸彈等恐怖事件發生。極右派的軍方以恐怖對恐怖的方法展開流血鬥爭，更使社會混亂。接着烏拉圭共黨就創設了「杜巴瑪羅斯」城市暴亂學校，模仿瓜地馬拉共黨城市暴亂的方式，使很多共黨武裝叛亂份子接受了城市游擊戰訓練。然後就與南美洲的哥倫比亞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巴西等共黨武裝叛亂份子密取聯繫，企圖使「杜巴瑪羅斯」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共黨城市暴亂組織。

共黨的城市暴亂，顯然的在「傳統派」共黨與「卡斯楚主義」爭論間，亦是一個不和協的現象，因為卡斯楚一向是主張「鄉村游擊戰」。但是卡斯楚面臨拉丁美洲各地共黨山區叛亂的挫敗，亦不得不迎合這種城市暴亂的方式。因此，卡斯楚就聲明，認為「鄉村游擊戰」與「城市游擊戰」在「暴力革命」觀念上，並沒有什麼改變。他說：利用拉丁美洲人民造反，不一定可靠，蓋瓦拉的失敗，就是過份信任農民。現在，游擊戰必須「城市化」，要盡量利用同情共黨的勞工、學生、知識份子及職業共黨，向大城市進攻，直接打擊各國政府的威信。所以烏拉圭共黨武裝叛亂，在強調「城市游擊戰」方面，並沒有引起與卡斯楚的爭論，相反的，卡斯楚曾使很多拉丁美洲各地共黨武裝叛亂份子到古巴接受「城市游擊戰」的訓練。烏拉圭的「杜巴瑪羅斯」中就有幾十個共黨恐怖份子接受過古巴訓練的。由於「杜巴瑪羅斯」

亦接連於卡斯楚的影響，所以烏拉圭共黨，一如其他拉丁美洲共黨內部鬥爭一樣，「傳統派」共黨與「武裝鬥爭」共黨之間，亦有着爭論。

在先前數年，由於蘇俄與共匪內鬩，已經把拉丁美洲共黨分化，而在卡斯楚與蘇俄發生歧見以後，拉丁美洲共黨就很明顯的分出「卡斯楚主義」與「蘇俄修正主義」兩派。近年來，蘇俄與卡斯楚都企圖對拉丁美洲共黨發生領導作用，更擴大了兩派共黨的分裂。一九六七年八月，卡斯楚召開「拉丁美洲人民團結組織」會議，企圖挽救拉丁美洲共黨分裂的危機。但是經過十天的會議，特別證明了拉丁美洲共黨「傳統派」與「卡斯楚主義」間的惡化；「主張以合法鬥爭取得政權」與「武裝行動奪取政權」兩派間展開激烈爭論。當時烏拉圭共黨第一總書記阿瑞斯孟第，就是此一大會的副主席。他曾在兩派歧見上發揮了調和作用，避免了兩派衝突走向破裂的危機。並且他亦阻止了古巴共黨代表哈特(Armando Hart)對蘇俄「和平共存」政策的指控，而可能引起與蘇俄的公開決裂。

阿瑞斯孟第能出任大會副主席，主要是他與卡斯楚私交甚篤，但亦與蘇俄有着密切關係。他曾指責「帝國主義」侵略，但亦曾被拉丁美洲青年夢想創造幾個越南而熱心於游擊戰所激怒。因此，他漸漸地反對古巴頭子們欲拒絕莫斯科路線而成為世界「第三革命勢力」的中心。從此莫斯科就認為他是拉丁美洲共黨優秀領袖之一。所以阿瑞斯孟第雖然在「卡斯楚主義」與「蘇俄修正主義」間的衝突，擔任了一個重要角色，但對烏國「杜巴瑪羅斯」城市暴亂從來就沒有妥協，而繼續領導「傳統派」共黨走蘇俄的路線。在阿瑞斯孟第認為，烏拉圭共黨不是一個秘密組織，亦不是一個非法組織，盡可以合法的手段來達到革命的目的。但是共黨城市暴亂的擴大，已招致政府的警告，不但造成政府與烏共間的緊張情勢，政府與其他共黨國家的關係亦陷入低潮，如此已嚴重影響了烏共的發展。由於阿瑞斯孟第不願看到因共黨的恐怖與非法活動，而使烏共遭到查禁的打擊，所以他就不斷譴責那些迷信暴力的恐怖份子，聲言「暴力革命」在烏拉圭永不會獲得勝利。

肆 烏共城市暴亂所造成的災難

「杜巴瑪羅斯」，在組織上是非常嚴密，生活亦極簡單，規定不准吸煙喝酒。據一般估計，恐怖份子有幾百人，分成很多小股，每股均有一百人在

右，小股中又分成很多小組，每小組不超過七人。在平時彼此隔離，不作聯繫。小組的每項行動以多數表決，經常是以閃電式的突擊行動，使警察不勝防備。一九六五年，恐怖份子首次投擲炸彈，並在聖誕前夕攻擊政府軍的卡車，搶劫蒙特維多的銀行。至一九六八年，「杜巴瑪羅斯」組織擴大，恐怖事件亦跟着頻繁起來。其中較為重大的，如一九六八年八月，帕西哥總統（Jorge Pacheco Areco）的親密顧問、大地主、全國電力公司總裁雷威貝爾（Pereira Reverbel）被恐怖份子綁架。同年十一月，有七個暴徒在中午搶劫銀行，劫去廿五萬美元。一九六九年二月，十個暴徒穿著警察制服，在東浦遊樂場劫去廿萬美元。又同年九月廿日，烏拉圭警察廳副長官遭恐怖份子擊傷，當場有兩名警察被擊斃。十月四日，山多斯（Santos）市府被恐怖份子攻擊，搶去一萬美元，市長亦受槍傷。巴西共黨恐怖份子綁架美國大使艾布西克（Burke Elbrick）事件發生以後，烏拉圭最大銀行家得萊格里尼（Gaetano Dellegrini Giampietro），以及兩個報社的負責人亦被「杜巴瑪羅斯」恐怖份子綁架，數日後又突擊一個法官的住宅。而其中最嚴重的事件，是在十月八日，蓋瓦拉在玻利維亞死亡的兩週年那天，有七十個恐怖份子佔領離蒙特維多卅里、擁有二萬居民的板篤（Pando）城，他們切斷電話線及外來支援，搶劫了所有銀行，獲款達四十萬美元。前來支援的警察，曾以六架直昇機與暴徒作戰，雙方均有傷亡。

伍 烏共城市暴亂的展望

取緊急措施，指令凍結薪金和物價，始壓制通貨膨脹下跌了百分之一七，並預期在一九七〇年，通貨膨脹率將不會超出百分之十。但是從烏國整個經濟結構來看，不但未來情勢不容樂觀，並且仍在繼續冒着通貨膨脹的危險。因為當前烏國的銀行及重要企業，仍均掌握在外國人手中。對外輸出仍僅限於肉、毛兩種，現代化生產結構和經濟開發都無法建立起來。（註二）此外，走私猖獗，國內資金大量外流，經常有十五萬人失業，再加上政府機構龐大，有廿二萬六千三百五十個公務員及卅二萬二千退休人員，已成爲政府極沉重的負擔。所以烏國政府如要遏阻共黨城市暴亂的風潮，必要勇敢的從事改革，使經濟與社會在漸進的改革中來消弭共黨暴亂的意圖。

從烏國人民方面來看，共黨的城市暴亂，從來就沒有獲得人民的支持。相反的，共黨的暴亂所帶給的人民災難，更加深了人民對共黨的痛恨。烏國人民多是歐洲人的後裔，由於他們對民主政治深表信念，從一九五一年就廢除了總統制，而模仿瑞士的委員制建立了「政府委員會」（The National Council of Government）來治理國政。雖然自一九六三年以後，因為通貨不斷膨脹以及共黨動亂，迫使烏拉圭已恢復了總統制，但是他們仍熱烈盼望着能够恢復以前的富庶與繁榮，以保持他們所享有拉丁美洲瑞士的雅譽。因此，當前烏國共黨暴亂，雖已造成了嚴重災害，但大多數人民仍確信烏拉圭的政治傳統，是決不可能以暴力的方法來達成恢復他們所懷念的往昔繁榮。同樣的，任何暴力革命方法，都永遠不能建立起他們所期望的國家安定與富強。

烏拉圭共黨參加歷次大選結果：一九五〇年獲選總票的2.29%，一九五四年獲2.22%，一九五八年獲2.69%，一九六一年3.49%。

註二：請參閱本刊八卷一期拙著「烏拉圭的經濟危機」一文。